

體制邊緣修國史

● 陳意新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卷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2008年5月，在香港發行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已出版六卷），無疑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大事。這套著述由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組織編寫並出版，不僅史實詳盡，規模空前龐大，而且可謂私撰國史，意圖以正視聽。這套著述主要涵蓋了以毛澤

東時代為主的1949至1981年的政治史，與當代很多中國人的政治社會生活曾休戚相關。如果說學者們對這套國史中事件梳理之清晰與檔案資料運用之細緻會留下深刻印象，那麼對於經歷過毛澤東統治時代的普通讀者而言，這套國史也許能讓他們解開一些影響過自己人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之謎團。

對於國史，中國歷來有官修與私撰兩大方式。官修為後人留下了二十四史，而私撰因其可對歷史事件作獨立記錄與評點，有時比官修來得更為真實和重要，正如孟子所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這套國史繼承了中國私撰史學的傳統，由非官方學術機構主持，邀請一批卓有成就的學者，摒棄政治意識形態準繩，以尊重史實的態度寫作，在計劃總數600萬字的著述裏，對毛澤東時代許多極具爭議的重大事件作盡可能的釐清。由於這套國史在香港出版，作者無須過於擔心書中語句或資料會被政治權威刪改，得以基於自己對歷史事件的認知和感悟而寫作，因此，與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共和國史著作相比，這套國史能夠更加完整和真實地重現歷史，其學術價值也相對較高。

這套著述涵蓋了以毛澤東時代為主的1949至1981年的政治史，與當代很多中國人的政治社會生活曾休戚相關。對於普通讀者而言，這套國史也許能讓他們解開一些影響過自己人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之謎團。

國史的多位作者全是專攻多年的黨史和共和國史學者，部分更任職於中央黨史研究室等中央級單位，有特權閱讀重要歷史檔案。正是基於這些學者和專家經年的資料積累，這套國史才成為言之有據、功力深厚的大作。

這套國史最引人矚目之處是對檔案資料的利用。在共和國時代，長期以來國史無法私撰。除了國家對史學著作的政治審查外，國家機構對歷史檔案的保密管理也根本性地限制了國史研究。儘管近十年來政治環境有所寬鬆，但由於國家的意識形態鬆弛度和檔案開放度依然極為有限，學者迄今為止所撰寫的共和國史很難不沿襲官方正統的聲音。對於大躍進與文革等一些被國家視為禁忌的重大課題，他們不但無法作透徹的研究，更無法暢所欲言發表看法，只能眼看着西方學者的專著一本本的出版。

這套國史在資料利用上有着特殊優勢。多位作者全是專攻多年的黨史和共和國史學者。除了使用筆名的作者外，其中有像沈志華、楊奎松、高華、李丹慧等來自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等著名學府、有能力接觸到重要歷史檔案的歷史學家，還有像林蘊暉、卜偉華、蕭冬連、韓鋼等一批任職於中央黨史研究室等中央級單位、有特權閱讀重要歷史檔案的專家。正是基於這些學者和專家經年的資料積累，這套國史才成為依靠檔案、言之有據、源流清楚、功力深厚的大作。當檔案資料亦無法還原歷史事件時，作者則利用自身的便利條件訪問了許多當事人，對事件作出了比檔案更完整的辨析。任何人只要讀一遍沈志華撰寫的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運動》，就會對這套國史的作者在檔案與訪談上所下的功夫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就已讀到的幾卷而言，這套國史在體例和寫作方法上也承襲了中

國的史學傳統。與以美國學者為主所編寫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相比，這套國史是以斷代而非議題來編排的。整套書每卷涵蓋約三至四年，企圖表現每個時段的整體史。這套書的寫作也沿襲了中國修史的習慣：述而不論。作者並未像西方史家那樣在資料基礎上總結出分析性的論點，而是以原始資料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這當然不是說作者沒有自己的觀點。在800多頁的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裏，卜偉華只寫了文革頭三年。作者表明雖然文革被官方定性為十年，但真正因動亂和浩劫而能稱得上是「文革」的也就是1966至1968年。這樣的體例和寫法，可讓讀者在看完史實後自己去反思這段敏感的當代史。

已出版的幾卷所具有的長處也匯成了這套書另一個明顯的特徵：體制邊緣修國史。這套書寫出了大躍進和文革等許多學者忌諱探討的歷史事件，令人耳目一新。但由於多數作者長期在中央單位以黨史研究為職業，在紀律上無法逾越國家對於使用檔案的規定，因此這套書在原始資料使用上便有了限制，只能走到體制的邊緣而無法完全脫開體制。在語言運用上，作者亦須有些匠心——只能走到邊緣，以免除不必要的政治風險。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多數作者似乎亦自然地傾向於從體制內來展開他們敘事的思路。儘管這些作者有着開放的思想，但長期的專業訓練、政治教育，以及組織紀律讓他們的話語和敘事形成了一些思維定式，以致就某幾卷而言，讀起來更

像是一部黨史，在敘述到毛澤東時更是難以突破思維定式和語言自律。對此，讀者當然不難理解：共和國有着黨國政體，黨史是國史的核心，從黨史切入國史的寫作正是這些作者的長處所在。但讀者亦不難發現：有的作者在敘事中一方面寫出了毛澤東統治下中國的大災難，另一方面又對毛個人的大氣恢宏、揮灑磅礴的風格充滿了欽仰，

依然維繫着對政治領袖既有的思維定式。其實，毛的大氣恢宏不正是共和國幾場大災難的成因之一嗎？

簡言之，這套國史最重要的成就，在於其有根有據地為毛澤東時代共和國的重大政治事件進行了正本清源的梳理。雖然它未能突破體制的極限，但卻已瀕臨體制的邊緣，為共和國的歷史留下了盡可能完整、真實、準確和可信的記錄。

讀《政體與身體》

● 黃小艷



黃金麟：《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下引只註頁碼）一書是台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黃金麟關於身體史研究的新作，與其《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對近代中國身體生成的宏觀論述不同，這本新書分析了江西蘇維埃時期中共圍繞反圍剿鬥爭所進行的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動員對民眾身體的調動，以及這些動員對建構階級化身體的重要意義，檢討了革命與身體的牽扯關係，並進一步對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善意與強制提出了發人深省的看法。

在歷史研究中，以身體的遭遇來取代政權更迭和階級鬥爭作為研究進路，就是要在原有的認識和討論之外，「顯露革命的一些錯置現象，和隱含在革命理想與實踐中的矛盾」。

一 革命與身體

作者選擇以身體作為研究蘇維埃革命的切入點，和兩個議題有關：一個是人的存在問題，一個是歷史的書寫問題，特別是有關中國革命的書寫問題（頁7）。人的存在問題體現了歷史研究對個體生命價